

【广西教育科学一九五一年规划重点课题】

雷沛鸿

国民教育概论

主编 ● 郭道明

副主编 ● 陈时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40-092.7

G946

——广西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

雷沛鸿国民教育概论

主 编 郭道明

副主编 陈时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雷沛鸿国民教育概论

郭道明 主编

责任编辑:赵小兵

封面设计:杨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204千字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633—2526—3/G·1845

定价:13.00元

第一章 教育功能与教育目的

教育功能与教育目的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也贯穿于雷沛鸿国民教育思想的始终,体现出雷沛鸿整体的教育观。雷沛鸿国民教育的其他问题,诸如教育体制、结构、课程、教学、教育管理都无一不与其教育功能和教育目的观相联系。因此,要全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雷沛鸿国民教育的精神实质,首先要了解和研究雷沛鸿的教育功能观和教育目的观。

第一节 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从总体上说,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强调教育对于发现人的价值、开发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方面的功能;二是强调教育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功能。教育究竟是为了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一直是教育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雷沛鸿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他对于教育功能的认识首先着眼于民族、国家和社会,但他又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又依赖于广大民众的力量,依赖于新国民的塑造。他希望通过活的动的富有创造力的新教育,塑造“新国民”,促进新文明,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秩序。

一、教育是建国大业的根本要图

雷沛鸿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的全局来考虑,把兴办教育作为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一项根本大计。他说:“今后革命建国,必须

多方用力,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本要图。”^①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迷茫但又在不断发生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的枪声宣告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的终结,但骤然的变故又引发了社会制度的数次反复。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此消彼长的国内军阀之间的争斗,各藏祸心的国外列强的染指,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外患既亟,内忧更殷,社会崩溃,农村经济破产。”^② 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与疯狂叫嚣更使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危机引发了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运动,新的政治、经济力量逐渐成长起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使得文化结构、国民心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与学界巨子纷纷投身于这场革命与变革之中。雷沛鸿即是其中之一。因此,他的教育功能观必然反映出当时“革故翻新、中兴民族”的时代特征。

雷沛鸿幼时由“中学”启蒙,后又留学英美,对中西方历史、文化都有着亲身经历和独特思考。他通过对丹麦教育的考察,得出一个结论:“丹麦人民所以能够有如许成功,实无他种技巧,他们不过运用一个烂熟的方法,那就是教育。”因为“教育的能事足以改造社会,又足以改造国家”。^③ 他研究诸国发展史和教育发展的传统经验后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凭借政教分离,使教育从教会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归国家管理的教育改革奠定了第三共和国的深厚基础。英国的学工运动、合作运动、宪章运动的发展是得力于伴随产业革命而产生的成人教育运动。丹麦格龙维创立,柯勒

① 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上),6 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 年(下引此书版次同此)。

② 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下),332 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 年(下引此书版次同此)。

③ 《雷沛鸿文集》(上),280 页。

继之的庶民学校与合作运动,普选运动相辅而行,使丹麦农村改造得以有‘一日千里’的进展。苏联成人教育中对政治盲、经济盲的扫除,配合了五年计划的进行和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①他回顾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沉痛地说,中国之所以被列强吞食,民众之所以被豪强宰割,除政治的腐败之外,其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因此,他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是“社会的一种重要机构和功能”。他坚信教育能够改造社会、改造国家。他认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不适合现代所有物质文明,这就是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来彻底改进,以求适应现代环境。如何彻底改造和全新创造新中国文明呢?那就是要发挥“教育的最大功能”,即创造功能。这种创造力,不论在生活历程上,或在社会历程上,都永恒地存在,继续地发展。也就是要从教育入手来改造社会,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文明。

(一) 教育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功能是建立在人类个体社会化需要及社会整体发展需要基础之上的。任何社会都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然后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必然引起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以至整个社会性质的变化。可见,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完善和进步状态。社会结构诸因素间的互动性决定了社会发展必须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发展过程。其中任何两个因素的不和谐都将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因此,社会发展的这种整体性要求决定了教育诸社会功能的发挥必须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不能仅仅着眼于社会的某个领域

^① 转引自《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二)207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下引此书版次同此)。

或某个层面。雷沛鸿在其教育的理论阐述及教育的实践中均对此做出了很好的阐释与实施。他说：“国民基础教育不单纯地只是教书读书的事业，它要随时随地反映现实社会而抓住社会问题的核心以解决民众生活问题。在广西来说，它以四大建设为外缘，以国民基础教育的力量助成本省下列四大建设：1. 政治建设；2. 经济建设；3. 文化建设；4. 社会建设。”^①而“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要参合本省四大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军事建设——来共同做一个安乐的世界、武装和平的世界、人人平等的世界、不生不来的世界，而措中华民国于万世无疆之休”。^②雷沛鸿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认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合，不能企盼某一问题能单独得以解决，而必须予以统筹规划，全盘考虑。他批评过去教育“缺乏整个性和一贯性”，“教育与政治分家”、“教育与经济分家”、“教育与文化不协调”，致使“支离破碎、无整个的组织”，导致“在曲线上演进”、“东一榔锤、西一板斧”之严重错误，并指出，“如果不加以纠正，无论现在或将来，教育一样会陷于破产”。^③因为“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不能各自分立，而是有相互联系的相关性，我们应该从它的相互关系中求其整个性”，“使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打成一片”，^④致力于社会整体的发展，以建立健全的社会新秩序。

“新社会中必须有新教育，新社会的实在建设，就是一种最生动的教育，新教育必在新社会中成长，而发挥其助成建立新社会秩序的作用。”^⑤“在现代中国正当社会脱节而陷于极大危机之际，教育却应启发社会，指导社会”，“努力助成新社会秩序的建立”。^⑥新社会秩序包括新政治秩序，新经济秩序，新文化秩序。建立新社会

① 韦善美、马清和主编：《雷沛鸿文集》（续编），385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下引此书版次同此）。

② 《雷沛鸿文集》（续编）385页。

③ 《雷沛鸿文集》（下）32页。

④⑤⑥ 《雷沛鸿文集》（下）234、434、378页。

秩序以促成整个文明的改造。雷沛鸿认为：“新教育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方法，不先立新教育，则不以实现新秩序。故新教育是工具，而新秩序是目标。有工具而无目标，则不免盲动，然有目标而无工具，则无以实现。所以我们便是要有计划，有意识地去实现新秩序，而以教育为奠定国家之基础的工具。”^① 雷沛鸿将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希望能借助教育的力量来保证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其所确立的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国民基础教育、国民中学、国民大学无一不在承担着促进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作用。也就是说，整个教育系统应该并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并能够立足于社会整体发展而不断地协调和修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平衡。雷沛鸿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四大建设用教育联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教育起着网络的作用。教育在四大建设中吸取原动力而增强，又用增强了的力量作用于四大建设，往复循环发展。为协调社会大系统的运转，雷沛鸿主张采用“一人三长”（行政、经济、教育）的方法使教育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社会中心，以促成社会的整体发展。“各种建设的成败，其程度之大小、高低、深浅，以教育事业成败程度之大小、高低、深浅而断定。”^②

（二）教育与政治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其政治功能就十分突出。古代东西方社会对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论述就十分丰富。到了近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愈演愈烈。斗争的方式也更加错综复杂，趋于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政治功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明晰和强化。

在旧中国，一些人不愿卷入当时恶浊的政治漩涡之中，希望能

^① 《雷沛鸿文集》（下），49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下），241页。

通过教育事业改善社会风尚,以此来挽救国家。但社会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充满“书生”气息的善良愿望不但无助于国家,更无助于教育本身。雷沛鸿指出:“过去的教育者以为教育可以超出政治,可以站在教育的立场,以教育者的力量来实施义务教育。这根本是不明了义务教育的意义所致。他们只将外国的教育名目搬过来,却不知义务教育在外国,根本就是与国家相依为命,所以政治与教育便打成一片,一面以教育来推进政治主张和力量,并以政治来完成教育的功能。”^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雷沛鸿已经看到教育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教育与政治必须“打成一片”,才能产生改进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强大力量,否则教育救国只是一个空想。教育与政治“打成一片”是有双重含义的,即依靠政治和改进政治。也就是说,一方面,教育要依赖于政治。雷沛鸿认为教育原为社会机能之一,其事业概寄托于社会,社会本身既欠健全,则教育改革之工程,无疑地终难执行顺利。这一认识说明了教育对于社会政治的依赖关系。教育宗旨的确立、教育方针的实施、教育制度的制定无不以政治为主臬;另一方面,教育要改革政治。雷沛鸿在分析当时中国现状时说:“国家的政治离人民是极辽远的,并不与人民接近。”因此,“中国人对于政治没有趣味”,“对于全国的政治非常冷漠,好似政治的得失与他们绝对没有关系一样”。^②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不要人民的政治是极其危险的。雷沛鸿认为若仍然“不给民众以教育的机会,不采取教育的态度方法,去唤起人民对于政治的注意,从而诉诸于人民的公共意志,政治民主化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③ 教育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不能舍去教育;没有教育的政治,不能成为政治,更不能成为政治建设的成功。雷沛鸿深信,培植民众的政治兴趣,建立民众

① 《雷沛鸿文集》(下),27页。

② 《雷沛鸿文集》(续编),2页。

③ 《雷沛鸿文集》(续编),80页。

的政治习惯的唯一手段就是教育。唯有教育,唯有生活的教育,才能达此目的。雷沛鸿提倡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扫除政治盲”,培养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新国民,使他们知道个人与国家及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使他们都奋发有为,投身到“救亡救愚”的政治运动中去,从而改造旧的政治秩序,建立起“平等的政治”、“法治的政治”的新的政治秩序。

(三) 教育与民族战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遭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雷沛鸿深信民众的力量,认为在民众中蕴藏着制敌御侮、挽救民族危机的巨大潜力。只是这种潜力需要教育加以引发。因为教育是民族生活的工具,“与民族生活与生俱来,随民族生命的延续而长生不老,因为民族生活是长生不老的,是需要教育以改造和推进的^①”。雷沛鸿曾发表《民族自救运动下之民众教育析义》一文,警醒地指出:“倘若民众教育在如此存亡绝续之秋,尚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它必须注意于民族生存的危机所在。这就是说,它不能令民众有一时一刻忽略外患,而又忘却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之大敌。”^②他认为,面对外强的入侵,必须运用整个民族的力量以图自卫,必须集合所有民众共赴同仇。“唯其如是,我们遂不能忘情于民众,尤不能忘情于民众教育。”^③雷沛鸿还多次援引国外教育运动对于赢得民族战争、争取民族解放所起作用的事例。以普鲁士为例,1807年被法国战败,完全屈服。德国教育家斐希脱看到了德国政治衰败的原因,在1807~1808年间连续做了十四次教育演讲,指示德国复兴的途径。教育家斯太恩创立义务教育和义务兵制度,以之为雪此奇耻大辱的准备。普鲁士人受这种义务教育和义务兵的教养训练。1814年联英败法,

① 《雷沛鸿文集》(上),123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下),36页。

③ 《雷沛鸿文集》(上),48页。

1870年三次普法战争终于得胜。普毛奇将军说：“败法者非我辈军士，实普鲁士全体之小学教师也。”^①再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开始注重教育，在各种人民的会议和国民会议中，大都主张用教育去改造国民的精神。雷沛鸿从法国革命中得出结论：“法国革命的成功不是杀人的结果，而是民族教育的功能”，“法国新政权的巩固，不是革命善于杀人的结果，而是民族教育发达的功绩。”^②因此，雷沛鸿认为，教育事业为民族生存所系，是抗战救亡的关键。因此，在民族存亡兴废的关头，应全心全意求民族生存，负起抗战的使命。他说：“教育是从社会生活的历程中生长的，因此我们在划时代的民族抗战建国历程中，也产生了划时代的教育。就是说，在抗战建国中，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划时代的伟大教育。”^③而且要从国民基础教育抓起，由成人而儿童，教育内容应以救亡和救穷为中心，而侧重于救亡。他在1938年草拟的战时民众教育方案中把教育目标分析为“唤起民族意识、激发爱国情绪、促进抗战意识、健全团结一致的国民心理、操练战时技能、发展民族生活力”六项，进一步强调教育对于抗战救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希望通过民众教育运动解救危亡。

把教育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强调教育对于争取民族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是我国近现代进步教育家的爱国传统。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的“兴学校”、“开启民智”到孙中山的“唤醒民众”，以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教育作为反抗外来侵略，振兴民族的重要武器，都在考虑如何运用教育这一重要武器来寻求民族解放。雷沛鸿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吸取和借鉴了国外的经验，把民众教育同民族战争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他说：“以教育为方法而恢复民族的自信心，在民族自救运动中，遂成为不可稍缓。”^④

① 《雷沛鸿文集》(下)，27页。

②③④ 《雷沛鸿文集》(上)，125、124、40页。

（四）教育与经济

雷沛鸿认为,办教育必须考虑经济因素,教育脱离不了经济。他指出,办教育“应考虑三个要素,第一是经济,第二是组织,第三是人才,而三者中尤以经济为首要”^①。而“经济”不单指财富、金钱、经费而言,它的涵义比较广泛,即国计民生都要考虑。所以,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强调教育必须要尽心求其适合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他批评中国过去不考虑本国经济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做法,指出:“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办的教育是不不断地自外国搬些洋货回来。”^②而事实上,中国社会经济根本不能配合这样的教育,其结果,使我们的教育不时表现出其弱点来。因此,他认为:“经济要素可以决定我们的做法。现在中国民众的能力,不能应用产业社会的教育。”^③

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教育也只有为经济发展服务才能有生命力。然而,旧的教育大体是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教育不能很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雷沛鸿曾举例说:“我国本来以农业立国,而且号称地大物博,在理似乎应能以农产物供给全世界,再退一步,至少应能自给自足,可是按之事实,却是大谬不然。”^④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旧教育对于社会实际需要无大帮助,对于广大民众生活,尤其漠然。教育未能培养学生“一副劳动生产的身手”,学生不能“把知识运用于民众”。因此,根据中国是一个穷国,广西是中国之穷省的实际,雷沛鸿强调广西的教育要不断致力于广西经济的发展。

为适应中国,特别是广西的经济背景和经济基础,雷沛鸿对旧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他改革的第一步是实施国民基础教育,“既要把教育普及于广大群众,又要动员广大群众从事伟大的社会建

① 《雷沛鸿文集》(下),172页。

②③ 《雷沛鸿文集》(下),173、174页。

④ 雷沛鸿《在就职宣誓典礼上的演说词》。

设事业,尤其是经济物质建设事业”。^① 他根据广西作为穷省这一经济条件,规定灵活的国民基础教育学制,并且主张“把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打成一片,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冶为一炉”,将每一村(街)的国民基础学校办成“幼稚教育的中心,儿童教育的中心,妇女教育的中心和壮丁教育的中心”。由于这种国民基础教育“建立在广西经济基础之上,广西的 1300 万民众生活之上”,所以,“没有能够解决的民众教育问题在广西总算得到解决了”^②。第二步是改革中等教育与社会经济需要相背离的现象,创立国民中学制度。雷沛鸿指出,当时的中等教育制度,一个突出的弱点就是普通中学强作主妇,统领整个中等教育阶层。这种单一的教育结构,不仅难以满足大批国民基础学校毕业生升学的要求,而且它以升学为唯一目的,导致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的严重脱节。因此,在中等教育体系中,“不可采取任何单一类型的制度,使之统理本层次中各方面教育活动,而求方方兼顾,面面俱圆;相反地,我们似应采用多型制度,以期它们分工合作,而适应社会的需要”^③。为了适应地方建设需要,雷沛鸿主张尽量设置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多类型多层次的工、商、矿、师范等学校。这种多类型的中等教育,适应了经济发展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并推动了广西地方经济建设。

雷沛鸿意识到,要改革教育与经济“两张皮”的状况,使教育与经济背景相适应,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就要对大学教育进行改革。他于 1945 年创建了西江学院。该学院与传统高等院校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不仅招收中学毕业生,也招收经过社会实践的青年;学生在校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是学以致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专业设置注重解决国计民生中最主要和最实际的问题,注重解决本地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西江学院为广西培养了一批实用科技

① 《雷沛鸿文集》(下),18 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下),58 页。

③ 《雷沛鸿文集》(下),428 页。

人才,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了使教育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雷沛鸿十分重视生产教育。他从考察分析欧美各国对“年纪幼小者”实施义务教育,对“年纪较大者”推广技术教育的事实中认识到,“国民所有生产力的大小实以他们所有读书识字的程度高低为正比例,又以技术能力的强弱为正比例”。^① 因此,向学生进行生产教育与国家民族的生存关系极为重要。他说,倘使我们的教育“不能具体地为民众解决民生问题,则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就不会密切,不会息息相关,终于落于爱国有心,救国无力,甚至因个人的生活不能解决,生存成为问题,以致蔑视国家的存亡,或乐观其变以图个人出路。因之,国民基础教育,复同时以生产教育为内容,欲以生产教育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骨干”。^② 他深刻地分析了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弊端,指出:“学生在校六七年,没有学到耕田的方法,做工的技术及经商的知能,一出学校便等于失业,成为脱离生产和鄙视生产的游民。那么,教育的功用也等于零了。”^③ 因此,雷沛鸿要求新教育必须注重对学生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在国民中学中,雷沛鸿规定,学生每周上课 34 小时,其中 8 小时应为生产技术课或社会服务课。生产技术课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可选择农艺、造林、园艺、畜牧、农产品加工等进行讲授。学生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使之不仅仅学习书本知识。由于加强了生产技术教育,学生学到了实用知识,有了一技之长,他们毕业后能够“回到田间去,回到商店去,回到工厂中去”,为发展工农业生产服务。这样的中学是能比较好地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所以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1942 年,广西几乎每县都办起了国民中学,全省有 80 所左右,盛极一时。教育适应了经济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确实“能达此境,教育才可告无

① 《雷沛鸿文集》(上),11 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下),176 页。

③ 转引自《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101 页。

罪”。^①

（五）教育与文化

雷沛鸿从广义上给“文化”作了界说，即“文化实包涵知识、道德、信仰、文艺、技术、风俗、器械、工具以及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及民众生活方式”。^②他认为，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的选择、组织和创造。文化是体，教育是用。文化演进是教育变动的主导。文化变动，教育就随之变动。教育也是推进文化、改进文化，创造文化的工具。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基于他对文化的广泛考察和深刻反省。

雷沛鸿认为，文化是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民众生活的象征，是人类对生活环境不断调整的产物。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与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传统的中国文化可以概括为“人本文化”，其特征为伦理观念的发达，以迷信、孝悌、仁义、廉耻为操行之原则。其反映在政治上专制而非民主，是法先王，而非法后王；反映在学术上是伦理而非自然，是演绎尊古，而非归纳创新；反映在经济上是家庭生产之农业社会而非社会生产之产业社会，是宗礼分明，而非竞争取巧；反映在宗教上，是祖先的祭祀而非造物主的崇拜，是多神教而非一神教。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了一种保守状态，即注重过去的保存和现在的维持，而忽略将来的创造。这种保守的人本文化，是适应家族与农业社会的。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急剧变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适应变化了的客观世界，必须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雷沛鸿着重指出，整个中国问题，严格地

^① 《雷沛鸿文集》（上），287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下），531页。

说,实在只是文化问题而已。他深刻认识到,文化的兴衰存亡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文化灭亡了,它将永远不能自救;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失去了共同的独立的文化,它就难以在国际民族家庭内独立存在。要对固有文化进行取舍,建设新文化,有赖于实施教育,以充分发挥教育的工具性,建设新文化与新秩序。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这中间包含着好的和坏的成分,教育者要在这中间用慧眼去抉择,存良去恶,淘金去沙。固然对固有文化不能和盘地保存,也不能和盘地加以推翻,更不能将外来的思想制度无条件地加以移植。不然,鹜新好异,先有‘无洋不好’的心理,希望能造福人类社会,自然万万做不到”。“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教育者常常忽视固有文化的抉择,对于外来的又常常生吞活剥,结果不但无益,而且有害。”^①

雷沛鸿认为教育是民族生活历程的产物,因而应根据民族的生活来建立教育。他说:“文化是教育的来源,教育政策的理想内容,乃是根据民族文化的遗留。”^② 因此,“我们应当于本国历史及本国现代民众生活索取教育渊源,唯有在如此深广渊源中,才可以探讨国民教育的各项目标”。^③ 在此理论观点的指引下,他对于广西地方文化进行了剖析,因为在他看来,“地方文化是地方教育设施的最大根据”。他说:“广西地方文化,大而言之,共有三个渊源:其一是中原文化;其二是高原文化;其三是低地文化或海洋文化。”三个文化渊源,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各自演化,又相互同化,相互学习。随之,互教互学的教育方法,就在千百年间无形地推行无阻。在此,雷沛鸿清晰地说明了三个文化渊源互相影响,各自成长,共同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广西地方文化的五个特征,即同化力、大同精神、质朴性和未成熟性、女性主义以及广西农

① 《雷沛鸿文集》(下),27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上),126页。

③ 《雷沛鸿文集》(下),71页。

业的复杂性。在对五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雷沛鸿提出要尽快把广西地方文化从“生存竞争”的阶段提升到“理智竞争”的程度,以摆脱贫穷、落后、愚昧的状况,适应新中国文明,新世界文明的进步。他反对忽视地方文化因素,盲目发展教育的作法,因为如果不问地方文化的异同,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只教条地执行上级法令,是一定要失败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雷沛鸿对于教育同文化关系的辩证态度。一方面,他看到了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教育应当主动地适应文化环境,从而为建设新文化服务。“教育是传递文化的工具”,“其作用是创造具有时代性及空间性的新文化”^①。加强文化建设,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但我们的教育抑或学校决不可以此托词卸责,相反,却要自告奋勇,自任先锋,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自己的文化职责”。^②“本来教育的功能在文化的传递,要想一个时代的文化传给下一代,便不能不加选择和淘汰功夫,决不能全部交给后人。古人说,‘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人’即是此意,不过中间要有决择的力量,决择的力量便是教育的功能”。^③为此,学校不应再是以校园为界的单纯的“读书”场所,各类学校都要成为一切的文化中心,效力于民族文化的创造,提高前进的民族文化,建立新文化秩序。这一新文化秩序,“在于使人在社会上充分享有生存权、工作权、教育权,使国民明了受教育乃是他们的权力。这样以教育为工具,将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具有进取精神”^④。

二、教育是开发民智,培养新国民的重要途径

雷沛鸿指出:“教育有两个特征:一为生长性,一为普遍性。”

① 《雷沛鸿文集》(上),126页。

② 《雷沛鸿文集》(下),385页。

③ 《雷沛鸿文集》(续编),194页。

④ 《雷沛鸿文集》(下),56页。